

中国乡村基层治理知识图谱分析

——基于多领域的比较研究

陈 升,张发栋

(重庆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400044)



摘要 乡村振兴对乡村基层治理提出了新要求,迫切需要加强相关研究。为了解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和趋势,文章采用文献计量可视化研究方法,通过多领域比较分析,发现乡村基层治理近几年受学界关注度有所增强,但是成果质量有待提升;作者与机构之间合作、交流少;共被引分析显示,研究基础力量、传播载体、基础文献影响力不够强。关键词聚类特征较为明显,分析关键词共现和时间分布,展现了研究热点和关注点的演变脉络;对聚类文献内容分析,较为清晰地展现了乡村基层治理研究对现实问题的回应以及对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的关注。乡村振兴的提出进一步激活乡村治理领域的活力,乡村治理成为迫切需要攻克的重点领域。

关键词 乡村基层治理; 比较研究; 知识图谱

中图分类号:C 9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9)05-0097-15

DOI 编码:10.13300/j.cnki.hnwxb.2019.05.012

近年来,党和国家日益高度重视乡村基层治理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强调要加快推进乡村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基层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必要基础,但当前乡村基层治理面临着村民自治不足、行政权力下沉、乡村秩序消解等问题,因此转变乡村基层治理结构,破除原有乡村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的不足,创新治理模式,建立新的适应乡村振兴的乡村基层治理体系势在必行。对此急需加强乡村基层治理研究,一方面梳理总结过往研究,明确乡村基层治理研究的成果与不足,另一方面根据学界关注点的演变脉络和现实问题展望研究趋势与研究方向,从理论层面指导助推乡村基层治理发展。

以往对乡村基层治理的研究较多的关注乡村基层治理的内涵、方式、主体、结构、路径等,但缺乏对已有成果的系统性梳理和计量分析。对乡村基层治理单纯的内容性分析,造成不可避免的主观性和客观数据的缺失,而仅有的对乡村基层治理计量分析的文章也只是以 CNKI 为数据来源,不能对其知识基础进行分析,难以全面把握其研究趋势。再者学界大量的其他领域文献计量研究,多是对单一主题的描述分析,鲜有相关领域的横向比较,会造成研究结论的片面性和主观性。为弥补过往研究的不足,文章以 CSSCI 数据库收录的 1998—2018 年有关乡村基层治理及相关领域的期刊论文为样本,采用文献计量学及可视化方法对比多领域的成果数量、研究力量、知识基础、关注点及其演变等方面的情况,从客观、科学的角度审视我国乡村基层治理研究的现状、发展脉络、热点和前沿趋势,以期为更加深入的开展乡村基层治理研究和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一、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CiteSpace 可通过一定算法处理数据,绘制知识图谱,通过节点、连线、网络致密度、中心性、聚类

收稿日期:2019-03-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中长期规划决策机制及方法论研究”(15AZD016);重庆市重大决策咨询项目“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视角下重庆社会治理创新研究”(20182B-11)。

作者简介:陈 升(1974-),男,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社会治理、政府发展规划。

类别等要素,客观、形象地展示相关研究领域热点动向、代表人物、代表文献等关键信息。因其可操作性强,功能强大,可视化清晰、可视化信息准确客观等优势,日益受到学界各领域学者的关注和推崇^[1]。基于此,文章选择 CiteSpace 软件作为此次研究的数据分析工具。

乡村基层治理、社会治理、城市社区基层治理三者都兴起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同属于治理范畴,且三者间关系密切,具有同样的理论基础、研究范式以及同类型的问题导向。因此,选取社会治理、城市社区基层治理作为研究乡村基层治理的参照对象有助于更加科学、客观的把握乡村基层治理的研究脉络和发展规律。借助 CiteSpace 绘制三个领域的聚类视图、演化视图,在比较研究中把握乡村基层治理研究现状、热点和前沿,对该领域进行较为全面、客观的剖析,也为新时代乡村基层治理研究的深入发展提出研究问题,判断研究趋势。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是本文数据的主要来源。其收录的学术论文及期刊质量较高、影响力较大,在社会科学界具有非常高的权威性和认可度。乡村基层治理是一个内涵和外延很广的概念,同时在该领域中,乡村基层治理与(农村)基层治理时常作为同一个概念使用,将基层治理纳入以乡村基层治理为关键词的查找范围,删去其中城市基层治理部分后,形成较为完整的分析样本框。分别以“乡村基层治理+基层治理”“社会治理”“城市社区基层治理+基层治理”为主题(词),发文年限设置为 1998—2018 年,在 CSSCI 中检索,分别命中 731 篇、1 545 篇、531 篇文献,对文献进行筛选,剔除相关度不高的文献后剩下 635 篇、1 485 篇、491 篇文献,构成本文比较研究的文献样本。

二、文献计量分析

1. 乡村基层治理研究的文献发表情况

通过分析年度发文分布能基本判断研究领域所处的研究阶段、热度和学界关注度。如图 1 所示^[1],1998—2013 年,发文量总体呈缓慢上升趋势,其中 2003—2006 年间增幅较大,2006 年达到 44 篇,是 1998—2007 年间年度发文量的峰值。2006—2013 年发文量波动较大,其中,2013 年的 29 篇为这一时段的最低值。2013 年之后呈大幅度增长,2018 年高质量文章发文量达到 107 篇,掀起乡村基层治理研究的小高潮。

为进一步对比和补充数据说明,本文检索 CNKI 中核心+CSSCI 收录的“乡村基层治理+基层治理”文章,如图 2,发现 2013 年以来其发文量也呈现井喷式增长。2018 年发文量已达到 196 篇,因此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乡村基层治理的热度在学界将继续提升。结合两幅图的发文分布,可将乡村基层治理分为三个阶段,即萌芽阶段(2003 年以前),探索阶段(2003—2013 年),快速发展阶段(2013 年至今),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应着不同的时代背景。

为更全面的把握乡村基层治理研究的发展状况,文章将与乡村基层治理相关联的城市社区基层治理、社会治理领域的发文数据与乡村基层治理进行比较研究,以弥补因缺乏参照比较而造成的主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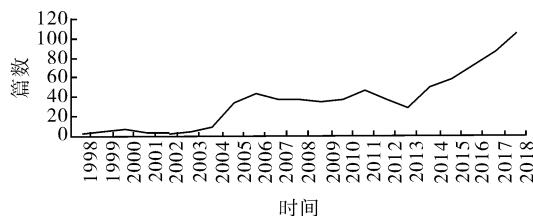


图 1 CSSCI 乡村基层治理年度发文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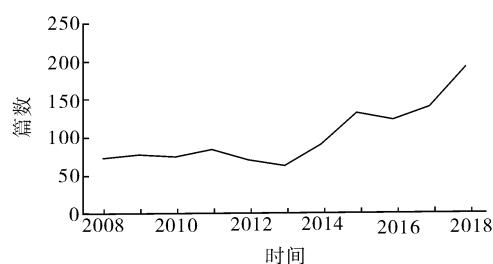


图 2 CNKI 指定数据库中乡村基层治理发文统计

^① 图 1 的数据来源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图 2 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中选定 CSSCI 为来源类别后的搜索结果。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仅限于 CSSCI 正刊发文数据,后者包括了 CSSCI 扩展版发文数据,后者的数据量大于前者。

判的缺陷。本文主要选取三领域的 CSSCI 数据库发文对 CNKI 中核心 +CSSCI 类文章的占比进行比较,以了解该领域的发展质量和效果。采集了三领域在 CNKI 和 CSSCI 数据库中收录的 2008—2018 年间的发文数据,并得到年度发文分布和高质量文章占比,如图 3、图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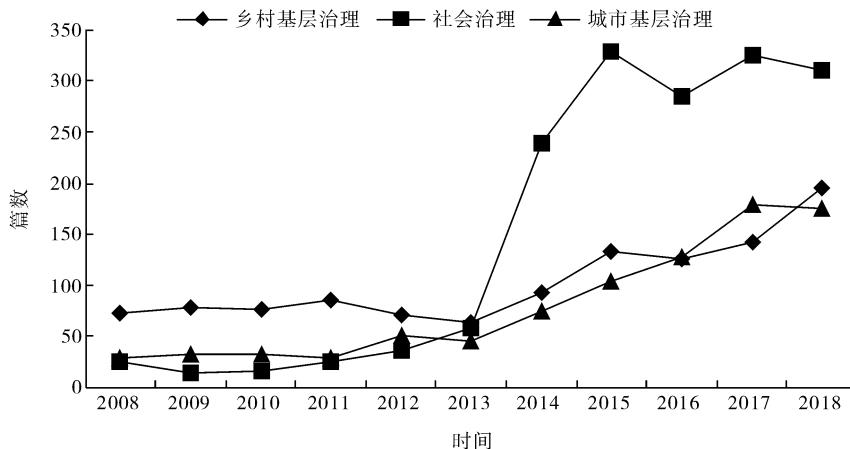


图 3 三领域 CNKI 年度发文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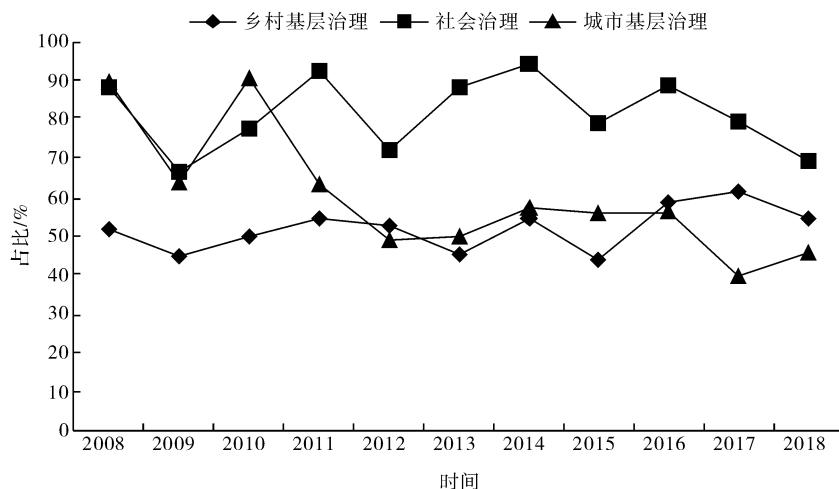


图 4 三领域高质量文章占比

图 3 是三领域在 CNKI 中核心 +CSSCI 来源上的发文分布,可以发现,2013 年以前,三领域的年度发文量都很少且相互之间非常接近,发文趋势较平稳,皆处于比较冷的状态。2013 年之后,三者的发文量都是增长态势,但其间的差距显著拉大,尤其是社会治理从 2013 年的 59 篇升至 2014 年的 240 篇,并在此后保持每年 250 篇以上的发文量,而乡村基层治理和城市社区基层治理 2014 年分别为 93 篇和 75 篇,乡村基层治理略多一点。2018 年以前,乡村基层治理的发文量总体上都多于城市社区基层治理,对比三领域发文量,可见乡村基层治理在学界的关注度位于中列。

高质量文章占比方面,由图 4 可知,2013 年之前,每年乡村基层治理高质量文章占比,在三领域中基本处于下风,在 2013 年之后其高质量文章占比总体低于另外两个领域,在 2016 年才开始超过城市社区基层治理。计算近十年的总平均占比可以发现,乡村基层治理以 52.1% 的高质量文章占比低于社会治理的 81.5% 和城市社区基层治理的 60.2%。由此可见在总体上,乡村基层治理研究取得较多研究成果,有一定数量的优质成果,但是明显不及社会治理的研究成果丰硕,成果质量不及社会治理和城市社区基层治理。且 2013 年以来,三领域的高质量文章占比呈下降趋势,但是乡村基层治理的高质量文章占比总体上在提升。

2.研究机构与作者合作情况

(1)研究机构合作情况。自 1998 年以来,华中科技大学共发表乡村基层治理领域的文章 49 篇,成果数量远超其他机构,影响力很大,在图谱中节点和字号最大,是国内研究乡村基层治理的中坚力量。其次是华中师范大学,发文 16 篇,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共发文 9 篇,说明这两个机构在乡村基层治理领域有较强实力与影响力。不过对三领域研究机构合作情况进行可视化研究发现,社会治理各机构之间连线很少,仅有 6 条连线,城市社区基层治理各机构之间连线有 4 条,乡村基层治理有 2 条,说明三领域都存在研究机构相互沟通较少,缺少合作,布局分散,有各自单独开展研究的特点,相比而言乡村基层治理的研究在这方面问题更为突出(见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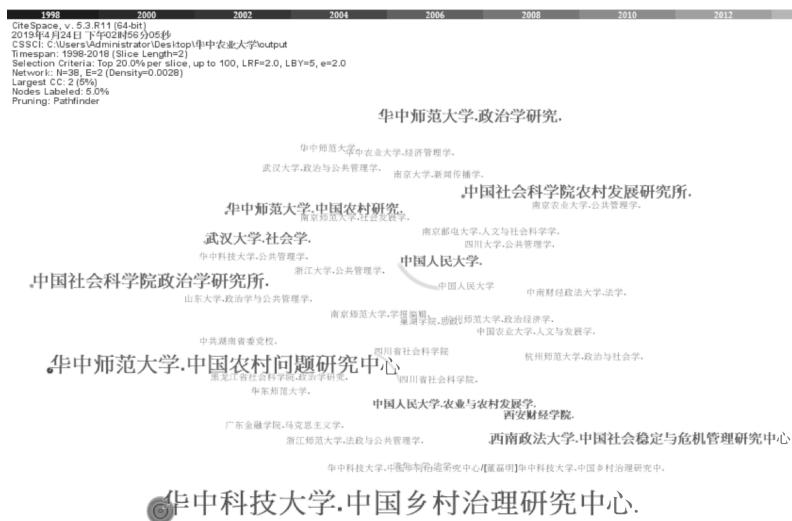


图 5 乡村基层治理研究机构合作图谱^①

(2)作者合作情况。学者的发文量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学者的学术能力以及在该领域的造诣,学者间的合作情况,能反映该领域研究中学者们的交流沟通情况。借助 CiteSpace 软件绘制作者共现合作图谱。如图 6 所示,结点字体的大小直观反映作者发文量的多少,比如乡村基层治理领域,贺雪峰发文量为 38 篇,位列第一,因此其结点和字体都最大。可见,贺雪峰非常专注于对乡村基层治理的研究,事实上贺雪峰在学界是公认的乡村问题研究的专家。其次徐勇发文量较多,为 13 篇,因此其字体和结点与其他相比都较大。温铁军发文 6 篇,排名第三。对比图谱,乡村基层治理作者间连线数量仅为 9,社会治理作者间连线数为 11,社区基层治理作者间连线数为 13。网络致密度方面,乡村基层治理的 $0.0033 < 0.0038 < 0.0131$ 。总体上说明三领域都呈现领域内学者间合作关系很少的结论,也再次印证了合作机构分析呈现的领域内合作关系少的结论。乡村基层治理,具有较多合作关系的有贺雪峰和董磊明、吴理财,很长一段时间内其隶属于华中科技大学乡村基层治理研究中心,他们被学界统称华中“乡土学派”,该研究团队在此领域的科研实力也得到进一步展现。

三、乡村基层治理研究的知识基础分析

1.作者共被引分析

作者共被引分析可析出领域内具有影响力的学者,展示基础性研究力量。通过比较三领域图谱节点数和连线数,如图 7,发现乡村基层治理作者共被引网络规模为中等,网络致密度最大,但三图谱网络致密度相差并不大。中心性方面,乡村基层治理共被引作者排名前 15 中,中心性在 0.1 以上者

^① 限于篇幅和为了更好的突出展示重点内容,此处仅放置乡村基层治理的图谱,如需要阅览其他两个领域的研究图谱可向作者索要。

有6人,其中以黄宗智的0.20为最高。社会治理中心性在0.1以上者有4人,最高者俞可平为0.14,城市社区基层治理中心性在0.1以上者有8人,其中0.2~0.3区间的有4人,以杨敏的0.29为最高。可见,乡村基层治理领域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学者还不多,在三者中居于中列。如表1所示,乡村基层治理领域被引较多的作者是贺雪峰、徐勇、黄宗智、杜赞奇等,其节点与其他节点连线较多,节点出现频次较多,说明这些学者以黄宗智为中心对乡村基层治理的理论研究为学界在此领域开展广泛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深刻地影响着国内乡村基层治理的研究,在乡村基层治理领域具有较强代表性和影响力。但也需意识到,专注于研究乡村基层治理,并具有公认代表性和学术影响力学者还较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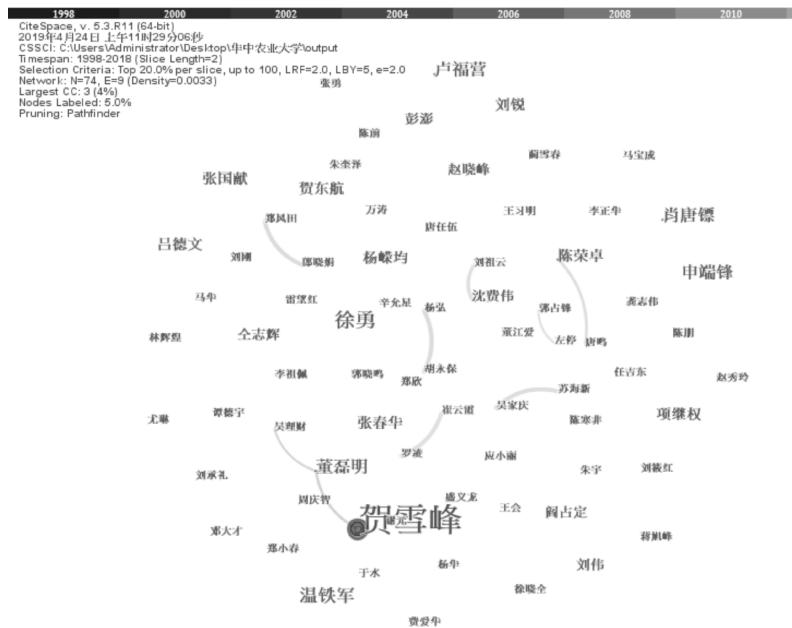


图6 作者合作图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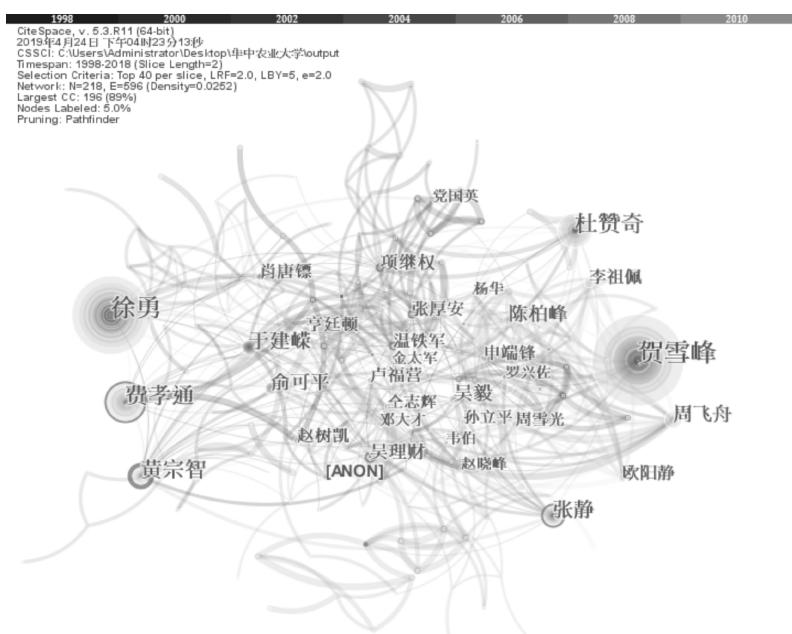


图7 作者共被引分析

表 1 三领域作者共被引比较统计

序号	乡村基层治理			社会治理			城市社区基层治理		
	频数	中心性	作者	频数	中心性	作者	频数	中心性	作者
1	199	0.06	贺雪峰	184	0.14	俞可平	81	0.14	俞可平
2	181	0.08	徐勇	115	0.12	张康之	58	0.26	陈伟东
3	102	0.15	费孝通	61	0.08	习近平	54	0.06	郑杭生
4	94	0.07	杜赞奇	61	0.03	郑杭生	46	0.29	杨敏
5	72	0.20	黄宗智	51	0.05	孙立平	41	0.23	徐勇
6	67	0.10	张静	46	0.03	费孝通	38	0.07	夏建中
7	62	0.07	于建嵘	42	0.04	吉登斯	37	0.11	吴晓林
8	54	0.08	俞可平	40	0.11	哈贝马斯	35	0.13	李友梅
9	53	0.08	周飞舟	39	0.08	马克思	32	0.04	林尚立
10	50	0.08	吴毅	38	0.05	王浦劬	29	0.07	魏娜
11	42	0.11	吴理财	37	0.02	李强	27	0.07	朱健刚
12	40	0.18	项继权	36	0.08	亨廷顿	26	0.05	费孝通
13	33	0.11	肖唐镖	35	0.02	李培林	26	0.24	何艳玲
14	32	0.06	温铁军	35	0.13	周雪光	25	0.07	孙立平
15	29	0.04	卢福营	33	0.04	姜晓萍	23	0.10	徐永祥

2. 期刊共被引分析

研究期刊共被引可清晰知晓哪些期刊专注于传播乡村基层治理研究,且具有较好的传播力。如图 8 通过比较网络节点和连线以及网络致密度可知,乡村基层治理期刊共被引网络规模在三者中最大,网络致密度中等,说明共被引期刊数量虽较多,但相互间的联系较少,较为松散。乡村基层治理共被引频次排名前十的刊物中心性在 0.1 以上的有 7 本,其中《开放时代》以 0.39 为最高,在图谱中节点最大,外圈紫色程度最深。社会治理中心性在 0.1 以上的刊物有 7 本,其中 0.3 以上的有 3 本,其中《社会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性为 0.34。城市社区基层治理中心性在 0.1 以上的刊物有 6 本,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的 0.25 为最高。因此比较共被引期刊在各自领域内的影响度,发现乡村基层治理位于中间水平,其高影响力的期刊少于社会治理。另一方面,三领域皆涵盖有相同的刊物,这些刊物在各领域的中心性各异,例如《社会学研究》在乡村基层治理的中心性为 0.19,在三者中居于中间位置,说明以上期刊对于乡村基层治理的关注度以及在乡村基层治理领域的影响力要次于其对社会治理的关注度和影响力,传播乡村基层治理研究的标杆刊物还很少,乡村基层治理排名靠前的共被引期刊在领域内的影响力需要进一步提升。

3. 文献共被引分析

对文献进行共被引分析,挖掘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文献,将进一步明确乡村基层治理研究领域发展路径和历程。图 9 和表 2,显示了文献的共被引网络及数据信息。通过查阅对应的文献,发现乡村基层治理方面,田先红一文共被引次数为 18 次,其中心性为 0.16。贺雪峰一文中心性达到 0.18。但此二者的两篇成果在乡村基层治理中的影响力不及姜晓萍、张康之、王浦劬的成果在社会治理中的影响力和地位,也不及郑杭生、吴晓林、朱健刚的成果在城市社区基层治理中的影响力和地位,如表所示,这些学者成果的中心性基本上皆高于 0.2,可见,乡村基层治理研究领域受到普遍认可的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成果还很少,共被引靠前的学术成果影响力也不够强,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打造具有核心作用的新时代乡村基层治理研究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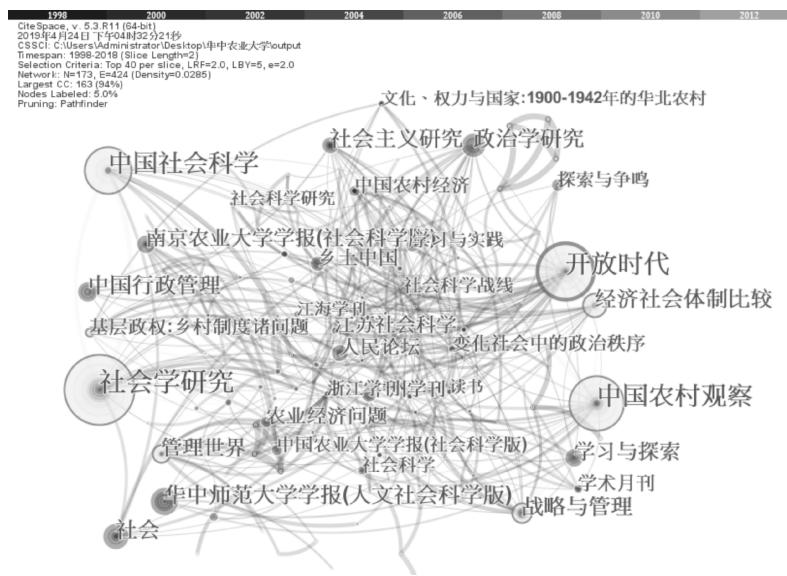


图8 期刊共被引分析



图9 文献共被引分析

表2 三领域文献共被引比较

领域	排序	被引次数	中心性	作者	标题	出版年	期刊名
乡村 基层 治理	1	18	0.16	田先红	从维权到谋利	2010	开放时代
	2	16	0.18	贺雪峰	论乡村基层治理内卷化	2011	开放时代
	3	16	0.15	折晓叶	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	2011	中国社会科学
	4	5	0.14	徐勇	县政、乡派、村治	2002	江苏社会科学
社会 治理	1	28	0.25	姜晓萍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2014	中国行政管理
	2	15	0.24	张康之	论主体多元化条件下的社会治理	2014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3	14	0.19	王浦劬	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2014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城市 社区 基层 治理	1	12	0.25	郑杭生	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和城市社区基层治理的新趋势	2012	甘肃社会科学
	2	4	0.23	吴晓林	“社区复兴运动”以来国外社区治理研究的理论考察	2015	政治学研究
	3	4	0.21	朱健刚	嵌入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区权力关系	2013	社会学研究

田先红一文对农民上访行为的逻辑变迁进行了梳理,探讨中国国家治理转型的成效,为乡村基层治理研究提供了一个解释性框架。贺雪峰一文,其主要着眼于农业税取消后,乡村各利益主体行为逻辑及其关系变化,研究地方政府与地方势力结盟的治理结构,得出乡村基层治理内卷化的结论。对后

税费时代乡村基层治理研究产生较大的影响。折晓叶一文主要探讨了国家向农村输送资源的“项目制”能够有效运行的逻辑,高度关联了加强村民参与度,实现村庄公共治理的要求。此三文都是在税费改革后、国家推行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探究因国家战略转型造成的政府与乡村关系的转变带来的乡村基层治理转型逻辑。而徐勇一文基于乡村社会转型和行政设置变化研究了“县、乡、村”之间的权力结构关系,明确提出合理划分各层级事务,使乡村基层治理合理化,此文较早奠定了乡村基层治理“由统到分”的学理逻辑。可以发现,乡村基层治理研究关注的问题由体制性结构问题转变细化到了治理主体的行为互动逻辑问题,并且深受社会变迁和国家战略的影响。

四、研究前沿分析

1. 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通过对三领域进行网络共现分析,考察乡村基层治理研究主题情况,如图 10。其中乡村基层治理图谱中共有 130 个节点,148 条连线,网络致密度为 0.017 7;社会治理图谱中共有节点 220 个,连线 367 条,网络致密度为 0.015 2;城市社区基层治理图谱中共有节点 88 个,连线 136 条,网络致密度为 0.035 5。三领域中,乡村基层治理关键词共现网络规模为中等,并与最大规模的社会治理差距较大,与城市社区基层治理差距较小。且网络密度也在社会治理与城市社区基层治理之间,说明,虽然乡村基层治理的研究主题不及社会治理多,但是主题之间联系密切程度要高于社会治理,不过从另一个层面讲,社会治理关注了更广泛的主题,涵盖面更广,使得主题之间的关系就相对分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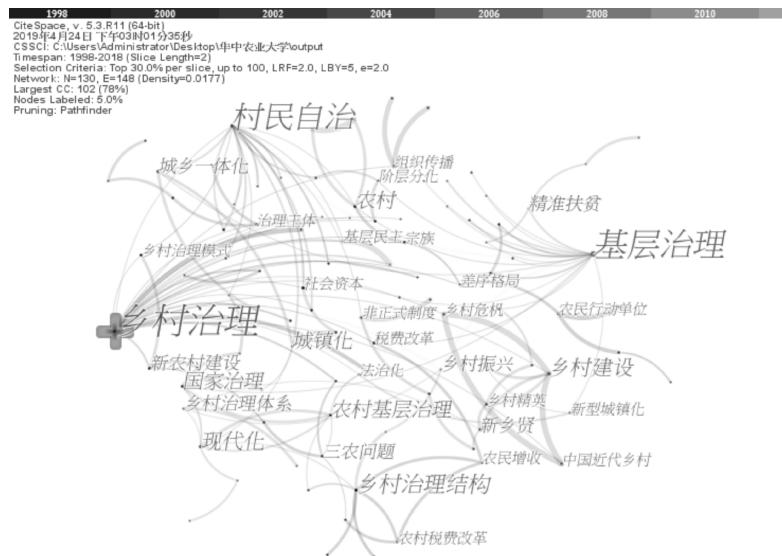


图 10 关键词共现网络

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和中心性能较为清晰的反映乡村基层治理领域的研究主题及其热点。本文统计了三领域出现频次排名前 15 的关键词及其对应的中心性,如表 3。乡村基层治理领域频次 20 次以上的关键词有“乡村基层治理”“基层治理”等,关键词中心性除“乡村基层治理”达到 0.67 外,“基层治理”中心性达到 0.41,“村民自治”为 0.38。社会治理领域中心性在 0.2 以上的关键词有社会治理、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国家治理、社会建设等。城市社区基层治理领域中心性在 0.2 以上的关键词有社区治理、城市社区、基层治理等。可见乡村基层治理相比于其他两个领域,还未产生更多的受到较多关注、热度较高的主题,呈现中心关键词较少的特质。而城市社区基层治理关键词中心性位于 0.1 以上的最多,呈现多点开花的特质,社会治理则以相对较多的具有较高中心性的关键词,呈现多中心的特质。进一步说明,乡村基层治理研究还相对不足,普遍关注的主题单一,还未对更多需要研究的问题给予充分的关注。

表3 三领域关键词比较

序号	乡村基层治理			社会治理			社区治理		
	频数	中心性	关键词	频数	中心性	关键词	频数	中心性	关键词
1	561	0.67	乡村基层治理	1 016	0.53	社会治理	373	0.41	社区治理
2	66	0.41	基层治理	51	0.10	社会治理创新	31	0.38	城市社区
3	46	0.38	村民自治	46	0.18	社会组织	25	0.60	基层治理
4	20	0.11	乡村振兴	41	0.21	基层社会治理	23	0.13	社区建设
5	14	0.04	新农村建设	31	0.12	社会管理	15	0.18	社会资本
6	13	0.05	税费改革	30	0.21	法治	15	0.14	社区
7	12	0.09	乡村基层治理结构	30	0.27	国家治理	14	0.23	城市社区治理
8	12	0.06	社会资本	29	0.23	社会建设	12	0.15	治理结构
9	10	0.05	基层民主	21	0.06	创新	11	0.12	社区服务
10	10	0.07	精准扶贫	18	0.10	大数据	10	0.20	社会治理
11	10	0.02	土地流转	18	0.11	民族地区	8	0.15	居民自治
12	9	0.06	国家治理	15	0.04	社会治理现代化	7	0.09	社会工作
13	8	0.05	乡村基层治理模式	14	0.08	社会工作	7	0.08	社区自治
14	8	0.10	现代化	14	0.08	协同治理	6	0.07	城市治理
15	6	0.04	城镇化	13	0.07	新时代	6	0.05	治理现代化

2.研究脉络及前沿辨识

乡村基层治理研究的主题、热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产生相应的变化。根据关键词的时间区分布,可以发现不同时段学界的关注点和热点,并可根据关键词的时间分布,预测乡村基层治理的研究趋势,如图11。乡村基层治理开始兴起于2004年左右,自此学界围绕此领域展开了一系列研究,早期(2005—2008)主要关注税费改革时期的村民自治、乡村基层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等问题;2010年左右,新农村建设和基层民主成为关注的热点,主要关注基层治理中的治理主体、乡村建设等问题;2013年中央提出新型城镇化,学界开始关注城镇化与乡村基层治理的研究,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并探索通过吸纳乡村精英等方式推动治理现代化;2015年后,精准扶贫、新乡贤,乡村振兴和乡村基层治理体系成为学界在乡村基层治理研究中的关注点,主要由于2015年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建设现代治理体系的目标以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等,为乡村基层治理的实践与研究带来新的议题和要求,形成学界在以上问题方面的热点。加强新乡贤等多元主体在乡村基层治理中的作用,积极开展协商民主,是新时代建设乡村基层治理新体系的主要方向。乡村振兴时期,面对日益增多的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由城返乡,乡村面临着更加复杂,多期叠加的治理态势,如何遵循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原则,充分培育乡村自治主体,激活乡村自治活力,理顺乡村与政府的关系,提升乡村基层治理能力,有效地将法治、德治、自治相结合,建立新的乡村基层治理体系,发挥好乡村基层治理的基础性作用,将成为新的研究议题。

3.关键词聚类及内容分析

关键词聚类分析旨在考察乡村基层治理研究热点及其聚类情况,以明确学界对乡村基层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哪几个细分领域。如图12,可以通过模块值(Q 值)和平均轮廓值(S 值)两个指标对聚类显著性和效果进行分析, Q 在 $[0,1]$ 区间内,当 $Q > 0.3$,则划分出来的社团结构是显著的,当 S 值 ≥ 0.7 时,聚类效果是令人信服的,若在0.5以上,则认为聚类是合理的。图12中,一共有8个聚类, Q 值为0.6513, S 值为0.6918,表明聚类网络具有较高的同质性,聚类效果较好。社会治理有13个聚类标签,网络致密度为0.0152, Q 值为0.6227, S 值为0.5562。社区治理有7个聚类标签,网络

致密度为0.060 1,Q 值为0.611,S 值为0.520 3,可见乡村基层治理聚类结构显著性和聚类效果相比而言更佳,说明软件对该领域细分领域划分较为全面和可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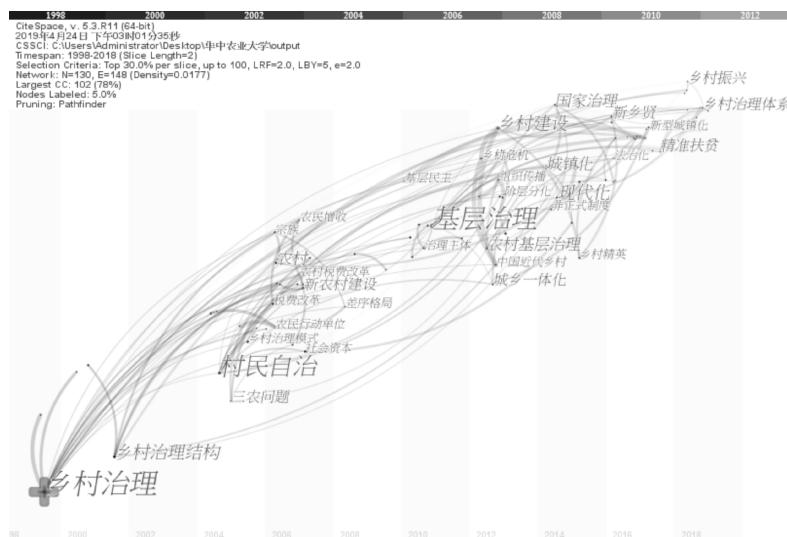


图 11 乡村基层治理时间空间视图



图 12 乡村基层治理关键词聚类

通过对数似然比 Log Likelihood Ratio(LLR)算法,图谱共导出 8 个主要聚类,聚类排序根据其聚类规模而定,说明基层民主的聚类规模是最大的。其较为清晰地展示学界所关注的乡村基层治理的现实问题与实践,以及为应对现实问题推动乡村发展与振兴的乡村基层治理体系演变与现代化过程。

乡村建设与发展在每个历史时期面临着不同的现实问题和发展要求,研究、探讨现实问题的原因、特征、趋势、以及对策路径是直接相关的工作;深度研究要通过不断的探索和研究更深入了解乡村基层治理规律,及其所涉及的内涵、主体、模式、机制与结构,发现乡村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演变过

程,明确发展趋势,以更好的从理论层面建构现代化乡村基层治理体系。因此,本文将以上聚类划分为两个层面:乡村基层治理的现实问题与实践、乡村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

(1)乡村基层治理的现实问题与实践。此部分依照时间先后顺序呈现聚类,以体现问题和实践内容的时代特征,以及聚类背后的社会学背景,呈现演变脉络。

1)村级债务,所对应的主要关键词是村级组织和区域差异等。学者们主要基于村级组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而且探讨了区域差异。村级债务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困扰乡村基层治理的大问题。贺雪峰针对这一现实问题,通过实证调查从村干部、乡镇干部和村民三方面分析了深层次原因和危害,提出要调整村治行政结构,加强村民自治;乡村基层治理工作应该保守稳健不能积极冒进,同时要减轻村民负担,加强村庄建设^[2]。继而又深入研究了债务的区域差异因素,发现农村社会状况的不同主要导致了债务的差异^[3]。在税费改革推进中,鉴于村级债务问题将影响改革成效,更多学者对化解村级债务对策进行探究,提出精简机构、优化财务制度,到后税费时代,项目制下形成的“项目内卷化”负债问题^[4],而需要探索新的治理方式。乡村债务的特征因国家与乡村关系的改变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2)阶层分化,所对应的主要关键词是阶层分化、土地流转、乡村基层治理转型。学者们主要基于土地流转等生产方式变化,来研究阶层分化,而且阶层分化带来了乡村基层治理的不适应,由此需要推动转型。21世纪初在我国农村因生产规模和方式的差异出现了阶层分化,农民阶层的分化,尤其是中农阶层的凸显,为乡村基层治理带来新的现象。有学者认为农民阶层分化对乡村基层治理带来了挑战,提出要比较不同阶层治村的差异、不同阶层的主体特征,同时指出了土地流转、阶层分化、乡村基层治理的内在关联,探索乡村基层治理发展方向和阶层基础^[5],推动乡村基层治理转型。但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精英再造过程加速了乡村再分化,由此必须要在推动资本下乡的新的时期,平衡好国家、资本、农民的关系^[6],维持乡村社会的稳定结构。可见阶层分化伴随着乡村社会变迁是一个持续深化的过程,而乡村基层治理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时代特征、问题导向,进行不断的转型与创新。而这就涉及乡村基层治理体系的演变与现代化过程。

3)新农村建设,所对应的主要关键词是乡村基层治理机制、三农问题等。新农村建设是后税费时期国家为加快推进农村发展实施的系统工程,旨在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动“物和人的新农村”齐头并进。在扩大基层民主中,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切实让农民群众当家作主。最初的研究集中于新农村建设中乡村基层治理迎来的机遇及其挑战和困境,主要认为加强村民自治、发展合作组织、培育新型农村公民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新农村的乡村基层治理模式应该是“强县政、精乡镇、村合作”^[7],也要因地制宜选择适合的治理模式。通过总结新农村建设乡村基层治理的思路,把行政化和自治化结合起来,解决好乡镇政府改革与农村非政府组织的培植问题^[8],也要重视乡村社会资本的培育,以发挥多中心治理模式在有效整合治理资源方面的作用。这一阶段也开始探寻乡村基层治理实践对治理理论的本土化诉求,以破解“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格局的结构性矛盾引起的体制性冲突和制度性制约,用新的治理理念指导解决乡村基层治理问题的新途径是建设新农村的实质。

4)精准扶贫,所对应的主要关键词是国家权力、现实困境、协商民主等。2013年国家开始全面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大规模的国家权力和资源倾注乡村,却因乡村基层治理劣化问题而受到阻碍^[9],表现在乡村基层治理所存在的自治不足、精英俘获、混混掌权等劣化问题使得扶贫工作难精准、难落实、难持续。实现乡村基层的有效治理是持续推进精准扶贫并顺利实现其目标的现实需要,而在这一轮贫困治理运动中,贫困问题作为乡村基层治理的基础性问题,对其治理为乡村基层治理带来了突破困境,实现善治的契机,势必推动乡村基层治理的变革,乡村基层治理的实践与转型应顺应贫困治理政策过程及其变迁并做出积极回应,以推动实现有效治理。因此,需要把握好精准扶贫和乡村基层治理两者的关系,针对关键问题和症结,选择科学的路径和方式。众多学者对精准扶贫中乡村基层治理空心化、自治不足、政策执行困境、精英俘获等问题进行分析,认为只有当国家权力与乡村非正式规则融合,与乡村社会力量相互交融,营造、构建一种协商民主环境氛围和工作机制,才能凝聚力量、动员并整合资源,为精准扶贫的有效推进奠定良好的乡村基层治理基础^[10]。

5) 乡村振兴,所对应的主要关键词是农民增收、乡村建设、新时代等。农民增收是乡村振兴的目的之一,而且在新时代,就是要通过振兴乡村,推动乡村经济、文化、政治、生态建设,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均衡的问题。国家向乡村注入了大量新的要素和国家力量,促使乡村社会新一轮结构性变化,对乡村基层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从新农村建设时期的主要依靠农民注入资源,到现在的推动农民市民化,将先进技术和人才、资本配置到农村的思路转变,必将要求乡村基层治理与之相适应。但是乡村基层治理存在着治理低效、碎片化等困境,难以为乡村振兴创造良好环境,需要探索优化路径,自发秩序的回归对“治理有效”作用重大。农村长期积累形成的价值共识,是保持乡村良好秩序的内生变量^[11],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就是振兴价值共识基础上的自发秩序,同时要培育多样化市场主体和自组织,在使农民增收,经济条件得到改善的基础上,培育新乡贤,形成政府治理、社会参与和群众自治的合作共治格局^[12]。乡村振兴战略是推动实现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机遇,这些嵌入到乡村的现实问题和政策,将促使政界、学界、乡村不断思考乡村基层治理的转型与发展。

(2) 乡村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近二十年来的乡村基层治理现实问题和实践举措的发展与演变,带动了乡村基层治理主体的关系结构调整、机制转变、模式创新,究其本质是乡村基层治理顺应时代变迁呈现的现代化过程。本文将基于基层民主、村民自治、农村基层治理等聚类,梳理、评述乡村基层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过程。

1) 基层民主的发展。这部分主要涉及基层民主和村民自治两个聚类,其对应的关键词主要是农村人口流动基层组织建设、现代国家、乡镇政府、农村社会组织、国家与农民关系、民主政治、城镇化、新乡贤、村委会、转型。很明显基层民主的发展过程,是乡村基层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过程,是多元主体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其中关系到国家、地方、社会的关系,也关系到乡村村民、村委会、农村基层组织的关系。

乡村基层治理包含着国家、村庄两个层面对乡村的治理,村庄层面的治理即为村民自治,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决定乡村基层治理必定从乡村典型政治权威治理向村民自治的民主治理转变。但是目前乡村阶层分化,要实现有效的村民自治,就必须选取合适的乡村基层治理主体,即乡村中谁更适合带领村民自治。富人治村在学界饱受争议,贺雪峰认为“富人治村”具有局部的合理性,但也会消解基层民主^[13]。仇叶对比研究多种类型的富人治村后认为公共规则型富人治村是可行经验^[14]。另外中农已成为村庄的关键性力量,“中农治村”是未来中国农村发展和稳定的关键^[15]。小农兼业阶层是农村的中间层,他们能融洽阶层利益关系,维护农村社会秩序,可发扬基层民主,有助于推动乡村基层治理转型^[16]。针对乡村基层治理主体缺位的问题,要从村治主体的治理单元、资源、规则三个方面再造主体。此外学者们还探讨了村民自治的制度与路径,其中协商民主被认为可以打破乡村单向度权力结构,而“赋权于民”,让村民成为真正的治理主体^[17]。肖滨认为要在“三元统一”中解决自治权内部的横向问题,在“多层共治”“自治下移”中解决自治权内部的纵向问题^[18]。徐勇提到要实现优质的村民自治就必须培育优质的村民,要弱化村民委员会行政功能,向自治回归^[19]。

长期以来农民公民权短缺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村民自治的发展,成为现代国家构建的主要结构性缺陷。为实现乡村“善治”的目标,需要凸显农民的主体地位,自上而下的民主激励强化公民权和政治认同,在通过体现村民公民权,强化政治认同意识中理性建构和完善基层民主制度。村治参与是衡量基层民主制度的核心指标。要实现和保障村治参与,进一步推进乡村基层治理新体系建设,就必须重视基层民主的建设和落实。樊红敏揭示了基层民主建设实践的基本特征和实现困境,提出要从能力建设、再造微观组织、制度运行等三个方面建设和发展基层民主^[20]。发展基层民主首先要明晰产权,再通过多元共治,实现乡村基层治理的有效服务^[21]。进一步研究发现,村务公开是基层民主制度的保障,是实现村民自治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目标的最关键内容。此外,乡村基层治理的基层民主建设要把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有机结合起来,解决好民主的质量、动力、方向问题。再者,不可忽视国家的力量,国家在行政放权给予社会自治空间的同时,要在规范和协调各种利益与权力关系中,为乡村基层治理提供良好的制度供给,以推动基层民主的实质性发展^[14]。

在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研究乡村混混与市场、村落、国家交互,可深刻理解乡村社会性质

和乡村基层治理。混混这一群体形成的关系组织结构,以其隐蔽性、分散性和强大的暴力威胁能力,危害乡村的社会秩序^[22]。田先红认为混混是活跃于乡村基层治理舞台上的一股重要力量,在某种程度上主导乡村基层治理的逻辑走向^[23]。部分地区乡村基层政权与地方势力形成联盟格局,“合谋经营”自上而下的国家资源和村庄资源,最终形成新乡村利益共同体。乡村混混在乡村去政治化,国家资源下乡时,加快了从“生计型混混”向“谋利型混混”转变,在“项目进村”时,促使了国家与乡村社会连接纽带的调整和失序^[24]。当混混成长为村庄精英,掌握村庄整治运作和公共利益分配,村庄权力格局就会失衡,村民自治便流于形式。混混治村一方面导致村庄分裂和发展受限,另一方面也会造成乡村社会处于脱离基层政府控制的危险^[25]。众多文献对混混治村的机理、危害、条件进行了探讨,但是对于如何破解混混治村,用良性的乡村主体力量,替代混混的作用效果,实现有效治理的路径探讨还比较少。

在农村社会组织方面,创建新型的农民组织是改善乡村基层治理、提高农民素质的迫切要求,是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有效载体^[26]。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使大量农户汇聚,巨大的社会资本得到集聚中蓬勃兴起,成长为乡村基层治理的新兴主体。合作社参与乡村基层治理使契约化、市场化、组织化更深入地嵌入进乡村基层治理机制中^[27]。对此合作社的发展应助力于培育和壮大农村社会中间阶层,促进社区发展,积极发挥治理功能^[28],与村组织结合创建一种新型乡村民主政治模式,强化多元共治力量,推进乡村民主政治化进程。特别是在乡村振兴时期,乡村大量资源的涌入将为合作社带来蓬勃生机,甚至也会衍生出新的组织形式,不断凝聚着乡村的治理资源,其必将在乡村基层治理中发挥越发重要的作用,加强对新型农村组织的研究将意义重大。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新乡贤”,依据文化网络逻辑,为新乡贤赋权,提供其在村治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合法角色。由此掀起了研究新乡贤参与村治的热潮。主要围绕新乡贤的再造、特点、参与村治的意义、路径进行了探讨。新乡贤要具备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特点,当前呼唤新乡贤,旨在发挥新乡贤对于基层社会的积极作用,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19],并逐渐成为跨越乡村基层治理困境的一个重要选项。对于如何参与村治,早期新乡贤一般在具体事件中通过新媒体与村民联合参与治理^[29],这是一种非制度化的行为。只有将新乡贤参与村治制度化,乡村基层治理能力才能提升,因此新乡贤返乡,重塑权力文化网络时,国家政权应为乡贤赋权,使角色合法化,与乡村精英群体融合^[30]。城市是新乡贤文化的孵化器,要加强城市和政府对新乡贤参与治理的推动作用^[31]。推进乡村振兴,必然会有一大批人力资源进入乡村,其中包括返乡务工人员、企业家、外地投资者等等,必将为乡村注入新的活力,如何激活他们的活力,吸纳其进入治理体系,新乡贤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2)农村基层治理转型。此部分主要基于农村基层治理聚类梳理相关文献,主要对应的关键词有现代化、治理模式创新、治理转型等,以上述治理主体、主体关系为基础,在相应的治理情境中考察主体间的互动模式,治理机制等问题,并根据现实问题的变化,探索模式创新与机制转型过程。在乡村基层治理结构转型的背景和前提下,学者们进行了充分探讨。在体制上,肖唐镖认为集权化和行政化的村治体制结构和性质,以及村民在地方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权利缺位造成了乡村基层治理的复合型危机^[32]。而土地制度、国家战略目标改变等也是影响乡村基层治理结构变化的因素。再者,乡村社会结构剧烈变迁,乡土社会越发呈现出理性化和利益至上的特点,正在由“权力的文化网络”向“权力的利益网络”转化^[33]。以至于在资源输送链条中,强势利益群体相赖相生,形成分利秩序,普通民众被排除而造成乡村基层治理内卷化,国家、基层组织、农民之间的利益与责任连带制衡关系断裂,乡村基层治理陷入困境^[34]。在城乡发展一体化作用下,“乡政村治”越发不能适应其发展,乡村基层治理结构的再造与重构便尤为迫切。

在转型路向方面,一部分学者聚焦于国家与乡村权力关系以及乡村自治力量的发展,认为关键在于行政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自治权利良性互动关系,加强农村各类组织在基层治理中同乡镇政府的协同作用。特别是在乡村社会新的社会力量发展的条件下,村民小组自治、片区治理等新形式出现^[35],要转变村民自治纯粹“群众自治”的性质,赋权村民,由下而上破除乡政村治的弊端^[36]。日益

强调主体之间的适应性关系,正值国家与乡村社会双向互动的“立体治理模式”成为乡村社会治理转型的新视野^[37]。同时要意识到土地作为一种多样化资本力量,可以在不同关系中发挥中心作用,以土地为中心的政治活动成为嵌入到乡村基层治理结构中的一个基础性要件。再者,基于对体制的研究,学者们认为,“新双轨治理”“三治合一”“任务型治理”等将成为乡村基层治理模式选择的重要参考^[38-40],但是只有选择与当地乡村相匹配的模式,才能实现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乡村社会本身与乡村管理制度是选择模式的两个重要变量。

五、总结与讨论

本文对比乡村基层治理、城市社区基层治理、社会治理的研究成果,发现乡村基层治理研究在近五年发展较快,但是发展速度和效果不及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特别是高质量研究成果不多。对比三领域知识图谱在合作作者、合作机构、关键词共现和知识基础以及关键词聚类等方面的表现,发现乡村基层治理领域的研究机构以及作者之间相对独立分散,联系性不强;受到普遍关注的研究主题单一,领域内受到普遍认可的,影响力较高的学者较少;共被引排名前十的高中心性刊物普遍少于社会治理,大多共被引期刊在领域内影响力较弱,缺乏标杆性的期刊;再者,该领域共被引文献中心性偏低,影响力偏弱,也说明乡村基层治理研究的专注度还有待提高。其研究成果对于领域内的影响力、指导力、带动力还不够强,研究成果产生的影响不够显著,但通过共被引文献挖掘了领域内基础性文献和主要关注点及其转变。

乡村基层治理研究在近几年虽得到一定发展,但是整体上还不够充分,学术影响力和政策影响力有限,较难满足乡村振兴对于乡村善治的要求。目前乡村基层治理研究主体以高校学者为主,黄宗智、贺雪峰、徐勇等学者的研究成果相对较为显著,影响力较大。但是作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显学,需要较多的学界与政界等跨领域交流与互动,在保持学术独立、科学、客观的前提下更深入地做好乡村基层治理研究,并及时转化为实际应用,而不是学术理论体系内关上门自说自话。乡村基层治理研究受政策驱动影响较大,长期以来,乡村基层治理研究与公共政策出台的步伐密切相关。从税费改革到乡村振兴,其背后都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和中央社会发展与治理的要求。通过关键词聚类分析,乡村基层治理主要研究内容归纳为乡村基层治理现实问题与实践、乡村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等两个方面,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乡村基层治理研究面向及理论架构。乡村基层治理外延仍在不断扩充和延伸,特别是在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下,乡村势必迎来规模型人口、资本等要素回流的反哺,造成农村的结构性变动,为乡村基层治理带来新的历史课题。大范围的跨学科交流与合作,大数据、网络信息化等手段和视角也将充分应用于新时代的乡村基层治理研究,乡村基层政治民主化进程将得到进一步推进和完善,乡村基层治理失序等问题将得到进一步缓解和破题。

乡村基层治理研究具有政策性与应用性,城市扩张时期,乡村和乡村问题在与城市和城市问题的比较中略显分量不足。但是 2017 年末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意味着高质量均衡发展理念的强化,将进一步提升乡村发展的分量。乡村基层治理问题在国家大战略发展中便显得尤为重要,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需要重点攻克的领域,必定需要产出更多优秀的成果。

参 考 文 献

- [1] 陈锐,陈超美,刘则渊,等.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J].科学学研究,2015,33(2):242-253.
- [2] 贺雪峰,王习明.村级债务的成因与危害——湖北 J 市调查[J].管理世界,2002(3):80-89,153-154.
- [3] 贺雪峰.论村级负债的区域差异——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J].管理世界,2005(11):82-92.
- [4] 孔卫拿.乡村建设过程中的项目内卷化负债——基于安徽 G 县的调研与思考[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4(4):49-64.
- [5] 林辉煌.土地流转与乡村治理的阶层基础——以江汉平原曙光村为考察对象[J].中州学刊,2012(2):92-97.
- [6] 梁栋.土地流转、阶层重构与乡村振兴政策优化[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7(5):1-11.
- [7] 郑风田,李明.新农村建设视角下中国基层县乡村治理结构[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6(5):126-134.
- [8] 聂火云,郑利华.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治理结构问题探讨[J].江西社会科学,2007(3):196-199.

- [9] 杨帅,温铁军.乡村治理劣化对新时期扶贫开发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探索,2014(5):144-148.
- [10] 曾庆捷.乡村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范式与实践[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47-56.
- [11] 丁胜.乡村振兴战略下的自发秩序与乡村治理[J].东岳论丛,2018,39(6):140-148.
- [12] 张新文,张国磊.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乡村治理转型与乡村振兴[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3):63-71.
- [13] 贺雪峰.论富人治村——以浙江奉化调查为讨论基础[J].社会科学研究,2011(2):111-119.
- [14] 仇叶.富人治村的类型与基层民主实践机制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17(1):52-66.
- [15] 徐嘉鸿.农村土地流转中的中农现象——基于赣北Z村实地调查[J].贵州社会科学,2012(4):84-90.
- [16] 刘锐.土地流转、阶层分化与乡村治理转型——基于湖北省京山县的调查[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2):92-100.
- [17] 赵秀玲.协商民主与中国农村治理现代化[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1(1):40-52.
- [18] 肖滨,方木欢.寻求村民自治中的“三元统一”——基于广东省村民自治新形式的分析[J].政治学研究,2016(3):77-90.
- [19] 徐勇.民主与治理:村民自治的伟大创造与深化探索[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4):28-32.
- [20] 樊红敏.基层民主建设的基本特征与发展走向[J].东南学术,2010(5):51-57.
- [21] 曹萍,王彬彬.城乡一体化下的乡村治理——以成都为例[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120-125.
- [22] 陈柏峰,董磊明.乡村治理的软肋:灰色势力[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4):142-146.
- [23] 田先红,高万芹.发现边缘人——近年来华中村治研究的转向与拓展[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7(5):124-132.
- [24] 李祖佩.“项目进村”过程中的混混进入[J].青年研究,2016(3):49-57.
- [25] 雷望红.民主制度供给下的混混治村及其后果——基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M镇的考察[J].中国青年研究,2018(4):68-75.
- [26] 蔡斯敏.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功能研究——基于甘肃省Z县X村扶贫互助合作组织的个案[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67-73.
- [27] 赵泉民.合作社组织嵌入与乡村社会治理结构转型[J].社会科学,2015(3):59-71.
- [28] 何慧丽,曲英杰.新型农民合作社的实践:结构社会学抑或行动社会学?——兼评《新型农民合作社发展的社会机制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15(12):155-160.
- [29] 方旭东.“事件团结”:新媒介与新乡贤共同体——基于三起乡村事件的实证分析[J].学术界,2017(11):82-96.
- [30] 白现军,张长立.乡贤群体参与现代乡村治理的政治逻辑与机制构建[J].南京社会科学,2016(11):82-87.
- [31] 万涛.权力的文化网络视角下的新乡贤返乡困境及对策——基于H省G村的调查和实验[J].城市规划,2016,40(11):21-29.
- [32] 肖唐镖.近十年我国乡村治理的观察与反思[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53(6):1-11.
- [33] 郑永君,张大维.社会转型中的乡村治理:从权力的文化网络到权力的利益网络[J].学习与实践,2015(2):91-98.
- [34] 陈锋.分利秩序与基层治理内卷化资源输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逻辑[J].社会,2015,35(3):95-120.
- [35] 刘金海.乡村治理模式的发展与创新[J].中国农村观察,2016(6):67-74.
- [36] 李勇华.乡村治理与村民自治的双重转型[J].浙江社会科学,2015(12):76-81.
- [37] 赵黎.新型乡村治理之道——以移民村庄社会治理模式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17(5):46-60.
- [38] 王向阳.新双轨治理:中国乡村治理的旧制度与新常态——基于四地乡村治理实践的考察[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7(2):67-79.
- [39] 何阳,孙萍.“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逻辑理路[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39(6):205-210.
- [40] 庄龙玉,龚春明.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理念与路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39(6):199-204.

(责任编辑:金会平)